

【思想文化】

试论项羽的复仇心理

程 远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8)

摘 要:特殊的家庭背景给项羽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所成长的楚文化环境、仇恨秦王朝的强烈氛围、从小所受的教育,使这颗种子生根、发芽、长大,形成了强烈地复仇心理。复仇心理使他在反秦斗争中勇猛、顽强、坚定、果敢,成为推翻秦王朝的最大功臣;复仇心理又使他动辄“屠城”、阬俘,伤害无辜,成为潜伏于其政治生命中的恶瘤,这个恶瘤在楚汉战争中爆发;复仇心理也使他变成了政治上的低能儿,该出手时优柔寡断,毫无政治远见,失去了由自己重新统一中国的天赐良机。

关键词:项羽;复仇心理;秦王朝;反秦

中图分类号:K234.1,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3)04-0006-05

On Xiang Yu' Vengeful Mentality

CHENG Yuan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y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special family background sowed the seeds of hostility in young Xiang Yu's spirit.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Chu Dynasty in which he grew up and the social atmosphere in which public had enmity attitudes towards Qin authority, and also the education he received in his childhood generated a strong psychology of vengeance which made him brave, staunch and firm in his fighting against the Qin Dynasty. But sometimes he "massacred the people", buried the captives and do harm to innocent persons which was becoming a potential "tumour" in his political life. It broke out in the war of Chu-han. His vengeful mentality made him incapacity in politics. He was always indecisive and politically shortsighted, which result in his missing the chance to reunite all the states of China.

Key words: Xiang Yu; vengeful mentality; the Qin Dynasty; anti-Qin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许多悲剧性人物,但是,很少有人能像项羽那样,那么长久的激荡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人们的情感。谁也不能否认,项羽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事奇才,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凭借农民起义的滚滚浪潮,把横扫六国、不可一世的秦王朝打翻在地,登上了号令诸侯的霸王宝座;谁也无法回避,他又是一位政治上的侏儒,不但没有把军事硕果转化成政治成果,反而在军事上高奏凯歌的同时,政治上节节败退,为自己营造着葬身之地。历史曾经那么垂青于他;重新统一似乎唾手可得,但他却漫不经心的放

弃了。像历史上许多悲剧性人物一样,项羽的成功与失败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复杂因素。项羽的独特性在于,他的成功与失败都与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联系在一起,即:复仇心理。复仇心理使他在反秦斗争中,把自己的军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了推翻秦王朝的最大功臣;复仇心理也使他成了政治上的低能儿,失去了重新统一中国的天赐良机。

一、复仇心理的社会背景与家族渊源

所谓复仇,是群体或个体受到伤害时,本人或其

收稿日期:2003-09-26

作者简介:程 远(1957-),男,陕西扶风人,西北大学博士研究生,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教学和研究。

亲属、族人、朋友以非常手段维护自身利益、惩治仇人的报复性行为。报复行为的局限性是:以亲疏远近划线,是非观念淡薄。但它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法制极不健全,强权和强势族群鱼肉弱小盛行的古代,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威慑强权者和强势族群,迫使其在欺凌弱小时有所顾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所以,古人肯定正当的复仇行为。甚至把它看成是君子必备的美德之一。

《礼记·檀弓》云:

子夏问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鬼。主人能,则执兵陪其后。^[1]

《礼记·曲礼》载:

父之讎,弗与共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同国。^[1]

如此具体地规定了复仇的范围和程度,一方面说明当时的复仇行为非常普遍。这种规定就是对这种普遍行为的规范。它不仅是对忍辱苟活者的鞭策,也是对过量复仇的制约。另一方面也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有仇必报已经内化为根深蒂固的道德律。有仇不报耻,有仇必报荣,已经成为评价人的重要标准之一。先秦史册中记载了许多复仇者的故事。如:严仲子使聂政刺韩相;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伍胥掘墓鞭尸,等等。就连西汉时的司马迁对此类行为也是赞叹有加。他称赞伍胥说:“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於后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岂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2]

因为复仇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所以,秦灭六国后,尽管强权高压,但明里暗里的复仇言行还是不断出现。韩国贵公子张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刺秦王,为韩报仇。”后来果然找了个能举一百二十斤大铁椎的大力士,“击秦帝浪沙中,误中副车。”^[3]有些人慑于秦王朝的威势,不敢明火执仗地对着干,也要写上条反秦标语出口恶气。如秦始皇三十六年,东郡落下一块陨石,有人在上面刻道:“始皇死而地分。”^[4]可见当时的反秦复仇情绪之广之深。正因为有这种遍布六国的复仇情绪,当陈胜、吴广振臂高呼时,才会出现“天下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尉”^[5]的反秦复仇大潮。

六国内针对秦王朝的复仇情绪非常普遍。相比之下,项羽的故国——楚国,复仇反抗情绪更为强烈、广泛和深刻。范增曾对项梁说:“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6]秦在灭楚的过程中,使用了欺骗、讹诈等许多不道德的手段。如:怀王入秦不反;张仪的六里与六百里等等。自己真诚地相信对方的许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欺骗愚弄,楚人的窝火、憎恶、仇恨可想而知。更为重要的是,楚与秦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秦国在历史上与中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长期交流,使秦文化融入了中原文化之中。而楚却有着迥异于中原的文化传统。秦统一后,在文化上没有采取兼收并蓄的宽容政策,反而高压、灭绝,企图消除异己。因此,秦占领楚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更为深刻地文化征服。楚人的抗秦斗争,本质上是楚文化求生存的斗争。楚人发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宣言,深层根源即在于此。

考查秦末农民起义就会发现:陈胜、吴广率先发动起义的大泽乡是楚地。随之而起的各支武装也大多是在楚地由楚人组织领导。起义的著名领袖人物多为楚国人,而且来自社会各阶层。起义以大楚为国号,后来拥立的王是楚王室后裔。可见楚人在反秦斗争中确实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项羽从出生到起义的二十余年,正是秦始皇“积七世之余烈”,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态势消灭山东六国的冲刺阶段。他2岁时韩亡,7岁时魏亡,9岁时楚亡,10岁时赵、燕亡,11岁时齐亡。他的幼年正是楚国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时期,也是楚人反秦情绪逐渐高涨的时期。

项羽的先祖“世世为楚将”,其家族命运与楚国的兴亡密切相关。项羽8岁时祖父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为楚国的生存作最后一搏。结果战败自杀。^[4]

秦统一后,项羽跟着叔父项梁逃亡在外,项梁成了项羽的监护人和培养者。项梁的一言一行必然影响着项羽,项梁也会按照自己的理想培养项羽。项梁是一位反秦斗士。早在陈胜起义前,他就已暗中做反秦准备,“阴养士生九十人”,“阴以兵法勒宾客及子弟”,并“铸大钱以具甲兵”。^[7]项梁如此重视利用各种机会发现和培养反秦人才,侄儿项羽自然是其培养的重中之重了。“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

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6]实际上,除“学书”、“学剑”、“学万人敌”等知识性、技术性的培养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心灵的塑造和情感的浇灌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家仇国恨在项羽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仇恨秦王朝的种子,悠久的复仇传统、特殊的家庭背景、楚文化的熏陶哺育、楚地浓烈的复仇氛围使这颗种子生根发芽。项梁又对其进行了定向性的强化培养,终于使其枝繁叶茂,达到极致,其复仇的迫切和强烈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当他看到出巡中的秦始皇时,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这时的项梁反而吓坏了,急“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6]但项梁内心肯定是高兴的,自己的投入终于有回报了,尽管是口头的。他知道这是发自内心的,也相信这宣言一定会变成具体的行动。从此,更加重视对姪儿的培养。

二、复仇心理的现实表现

复仇心理使项羽成了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曾是项羽部下的韩信,投奔刘邦,被授予大将军后,纵论天下,对项羽有一段十分精辟的分析:“项王暗噫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致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遣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於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8]据《史记》记载,当时许多著名人物在不同场合对项羽有过类似的评论。从这些评论我们可以看出,项羽既凶暴残忍,又有“妇人之仁”;既有破釜沉舟的果敢敢为,又有鸿门宴上的优柔寡断;既是一位崇尚武力的英雄汉,又是一位缠绵悱恻的有情人。项羽为什么有这些矛盾着的性格特征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复仇心理。复仇心理使他对仇人特别恨,以至于到了丧失理智、极其残忍的程度。他首次独立作战,就以令人发指的“皆阬之”开始。“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阬之,还报。”^[6]“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屠之。”^[6]巨鹿之战后,他又命“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6]秦王朝灭亡后,“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珍宝、妇女而东。”^[6]等等。

仔细分析项羽暴行就会发现:他的施暴主要针对两类人:一是秦王朝及其下属和军队;如:阬襄城,屠城阳,杀子婴,火烧秦王宫等。二是阻碍或有可能危及他反秦复仇的人。如:怒杀宋义,阬秦降卒等。

也因为复仇心理,使他对“朋友”特别“仁慈”,“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这里的“人”,显然是指反秦队伍中的士卒、将领,是与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有时到了丧失原则的程度,最典型的是放走对手刘邦。

他的果敢敢为,是在面对强秦,决定是否拼死一搏的关键时刻,如巨鹿之战;他的优柔寡断是在面对反秦阵营中的“同志”,决定是否抽出屠刀之际。如鸿门宴上的所作所为。

可见,项羽性格中的矛盾,实质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根源于同一个心理因素——复仇心理。

三、复仇心理的社会效果

项羽的复仇心理,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反秦的坚定性、勇敢性和彻底性上。

当时的反秦阵营鱼目混杂,目的各异,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类:

一是不堪忍受秦的残酷剥削、压迫,为求生存起而反秦者。这是反秦的主力军,以陈胜、吴广为典型代表。

二是以裂地而封为目的者。如:武臣、韩广、田儋等。这类人有知识,有文化,见多识广,政治意识强,多为起义队伍的上层。楚汉战争时,刘邦正是利用此类人的这种心理,“取非其有以与人,行虚惠而获实福”,壮大了自己,孤立了项羽。

三是恢复六国者。陈胜率领起义军攻下陈县后,欲自主为王,张耳、陈馥向陈胜建议:“立六国之后”^[5]。陈胜牺牲后,项梁成了起义军的核心人物,范增说项梁,把陈胜失败的原因归于不立六国之后,并劝项梁立之。^[6]直到楚汉战争时,还有人劝刘邦“复立六国后世”。^[9]可见这股潮流具有明显的广泛性和持久性。

四是借机复仇者。如:前期的张良等。

当然,具体到反秦阵营中,情况并非像我们所列举的这么泾渭分明。有的人可能同时具有几种目的;有的人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发展,目的也在不断变化着。譬如刘邦,起初是为求生存而反秦的,随着势力的增强,又有了裂地而封的愿望——希望王关中;

楚汉战争时,又发展为统一中国,以成帝业。

目的不同,反秦的态度也就有了很大差异。“裂地而封”和“复辟六国”这两类人,当他们的目的已经实现或部分实现时,反秦热情就大为减弱,甚至置反秦大局于不顾,只求自保或自强。武臣奉陈王之命占领赵地后,马上自立为赵王。“陈王使使者贺赵,令趣发兵西入关。”^[5]武臣不但不从命,反而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楚已灭秦,必加兵於赵”,于是,派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认为这样一来,“楚虽胜秦,不敢制赵。若不胜秦,必重赵。赵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10]

为求生存而反秦的一类人,大多处于反秦队伍的下层,他们与秦王朝不共戴天,是反秦的中坚和主力军,具有无比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因为,秦王朝不灭,他们就无法生存。

项羽反秦既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复仇。向秦王朝复仇的最佳方式就是把它推翻。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此类人具有不顾一切,不计后果,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勇敢性、坚定性和彻底性。这一点在巨鹿之战中表现的最为典型。当时,来救巨鹿的有十余支诸侯军,都被秦军强大的威势吓软了,“莫敢纵兵”。就连被困者张耳的“刎颈交”陈余和张耳的儿子张敖,也都为了保存实力,“未敢击秦”。而项羽却报仇心切,面对宋义“久留不行”,心急如焚,在进谏不果的情况下,怒杀企图“先阡秦、赵”,秦“战胜则兵疲,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6]的卿子冠军宋义。掌握兵权后,立刻“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接着亲自“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决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取得了巨鹿之战的全面胜利。项羽也凭自己的勇敢、善战,凭自己在反秦斗争的关键时刻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6]可见,这时,项羽的复仇心理与反秦斗争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以这种心理为内因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性、坚定性和彻底性是巨鹿之战取得胜利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是彻底推翻秦王朝所应该具备的意志品格。因此,在反秦斗争中,项羽登上上将军的领导地位,有力地推动了反秦斗争的发展,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项羽的复仇心理不仅有正面效应,也有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首先,他只以复仇为目的,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蓝图,更谈不上政治远见。初,楚怀王“与诸将约:

‘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之杀项梁,奋愿与沛公西入关。”^[9]请注意,他的请战是因为仇恨。正因为如此,当他杀了秦降王子婴,一把火烧了秦宫室后,大仇已报,反而无所适从了。除了“收其货宝妇女而东”,说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赭夜行,谁知之者!”^[6]之类小儿见识的话之外,又能有什么更大的作为呢?到手的政治成果就这么被他漫不经心地放弃了。

其次,因为他只以复仇为目的,在复仇过程中,看见仇人就像斗牛场上的公牛看见了抖动的红布,立刻亢奋起来,恨不得食其肉,碎其骨,寝其皮。追求的是解恨、痛快,因而,手段极其残忍。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果只有转化成政治成果,才是真正的胜利。攻关夺隘,徇城略地,只有以征服人心为基础,才能巩固,才能持久。如果单纯追求胜利而不计手段,不考虑后果,这样获得的胜利常常不能转化为政治成果,有时,反而会成为政治征途上的巨大障碍。项羽只知复仇,不懂政治,因此,尽管他每战必胜,但每一次以极端残忍的手段取得的胜利,都是一次政治上的大溃败。如:项羽入关后,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解恨固然解恨,但代价是,“秦人大失望”。这就与刘邦形成了鲜明对比。刘邦入关中,“所过亡得卤掠,秦人皆喜”。受降之后,又与秦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飧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食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惟恐沛公不为秦王。”^[9]在楚汉战争的五年间,关中之所以能够成为刘邦集团稳固的后勤保障和兵源补充基地,根本原因就是项羽的所作所为失去了秦人之心,人们怕其取胜;而刘邦的一系列措施征服了秦人之心,人们惟恐其不胜;故尔倾其所有支持刘邦,以打败项羽。

项羽在复仇心理驱使下的暴行可能引起的政治恶果,当时,许多人已经看到了。项羽请求“西入关”时,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僇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无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僇悍,今不可遣。”^[9]诸老将对项羽的认识是准确的,也是深刻的。

尽管项羽复仇暴行的政治恶果已被许多人所认识,但项羽的暴行在反秦斗争中主要是针对秦王朝及其爪牙的,与推翻秦王朝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其政治恶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当秦王朝灭亡后,

特别是楚汉战争时,它的恶果就凸现出来了。因为,历史又一次面临着选择。所谓历史的选择实际上是民心的选择。这时,人们的心理预期决定着人心的向背,而被选择者过去的行为则是人们心理预期的惟一依据。即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人心者得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政治人物从他走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天起,就在民众心目中塑造着自己的形象,都是在拉近或推远着民心。因此,当历史要求人们在项羽和刘邦之间作出选择时,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就凸现出来,成为人们判断取舍的重要依据,人们将以此为根据,预测他们未来的作为,并作出选择。如果说,刘邦的宽厚,项羽的残暴,在反秦斗争中还没有显现出十分明显的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巨大作用;在楚汉战争中就已经上升为人心向背的决定因素了。可以说,项羽在反秦斗争中的一系列暴行,已经种下了罪恶的种子,楚汉战争中,他不得不自食

其果了。

参考文献:

- [1] 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 司马迁. 史记·伍子胥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 司马迁. 史记·留侯世家[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 司马迁. 史记·秦始皇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5] 司马迁.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6] 司马迁. 史记·项羽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7] 太平御览(卷835)[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8] 司马迁. 史记·淮阴侯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9] 司马迁. 史记·高祖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0] 司马迁. 史记·陈涉世家[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责任编辑 杨彬智]

(上接第5页)

“醉石”、“濯缨池”等诸多著名的旅游景观。他们还吟诗作画,热情讴歌赞美庐山,又有力地宣传了庐山美丽的风光,大大提高了庐山的知名度,吸引了更多的游人来此旅游,庐山因而成为了一座旅游名山。又如茅山,本是一个不太出名的山林,但著名隐士陶弘景来此修行旅游后,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天,名金坛华阳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道,来掌此山,故谓之茅山。”^[7]经过声名远扬的陶弘景的宣传及开发,茅山顿时成为了道教圣地及旅游胜地了。其它山林如武夷山、天台山、衡山、罗浮山、四明山、大涤山、钟山等,其文化和旅游建设在这一时期也都得到了极大发展,这也都得益于集中隐居山林的隐士其大力开发建设。因此,东晋南朝隐士集中隐居于山林,在促进山林文化建设的同时,又大大促进了山林的旅游建设。

综上所述,在集中隐居山林的隐士作用下,东晋南朝山林中兴起了文化建设与山水旅游的热潮。山林的这股风气不仅促进了山林的文化及旅游发展,而且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山林隐逸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又必然会在整个慕隐成风的东晋南朝社会不断扩散,甚至在以后的社会传承,山林的这股风气也自然会随之扩散,从而影响当时社会文化及旅游的发展。当时社会出现了“所谈亦不专讲五经,五经之外,仍不废《老》、《庄》,且又增佛义”^[7]学

术活跃景象,私学教育兴盛,山水旅游成风,就连妇女也“游视畋渔,登高临水”^[8]。在这里,山林隐士起了一定的感染和告示作用是无庸置疑的。可以说,在东晋南朝社会里,山林隐士是文化建设的楷模,又是山水旅游的急先锋,在其言传身教的文化传播中、娱情冶性的山水旅游足迹中,无不浸透了他们为中国古代文化及旅游发展流下的汗水。

参考文献:

- [1] 李延寿. 南史·侯景传(卷八十)[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 [3] 沈约. 宋书·隐逸传(卷九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 房乔.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 姚思廉. 梁书·处士传(卷五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6] 萧子显. 南齐书·高逸传(卷五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 [7] 赵翼. 廿二史札记(卷八)[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8] 葛洪. 抱朴子·疾谬(卷二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责任编辑 杨彬智]